

沈 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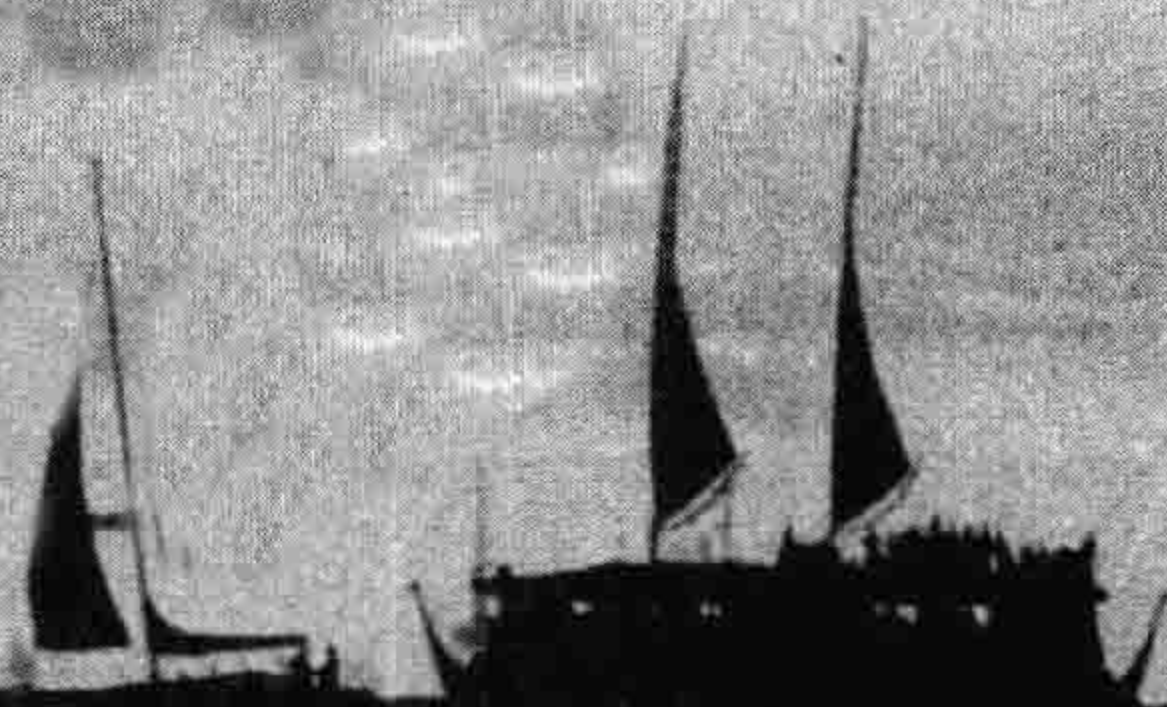
陈琢如 著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沈从文

陈琢如 著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况味/陈琢如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—7—227—03382—0

I. 况… II. 陈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5334 号

况味

陈琢如 著

责任编辑 李秀琴
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
开 本 710mm×960mm 1/16

印 张 14

字 数 223 千
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—7—227—03382—0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致读者

一位著名作家说，小说是闲人写下的废话，我颇赞同。

我这个人很懒，不愿意进行缜密的考证，不愿意引经据典，去写字字都要推敲的论文，起初只写诗，写些不着边际的胡话，后来觉得诗的容量太小，于是便写起所谓小说的废话来了。然而这些废话却是我的呕心沥血之作。

亲爱的读者，如果你有空，请你将拙作翻一翻，因为真知很像废话而废话也很像真知，我写的这些煎熬心血所析出来的废话烙有岁月的深痕，说不定还有真知的影子呢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解释说，“况味”是“境况和情味”。我把拙作集取名《况味》，不仅因为其中有一篇《况味》，更因为——

对我来说生存是一种况味，体验是一种况味，写作是一种况味，发表又是一种况味；

对读者来说阅读是一种况味，消遣是一种况味，领悟是一种况味，批评也是一种况味。

然而，我需要的是真知灼见的批评，而不是几块钱买一筐的庸俗的评论，更不是忽悠和意淫。

希望以我浅陋的《况味》，带给你更多酸甜苦辣的况味。谢谢。

目 录

昼 梦

昼 梦	(3)
热 殇	(17)
僻 壤	(35)
一切都会过去	(41)
血 疑	(51)
相见时难	(63)
年 代	(76)
四朵花	(85)
黑夜的跋涉	(96)
岁 月	(103)
西瓜情结	(112)

困 惑

一犬二主三幕剧	(125)
冬雪·国魂	(130)
方 寸	(137)
耻为文丐	(143)
况 味	(154)

此一时,彼一时	(166)
失 落	(175)
心绪如丝	(183)
困 惑	(191)
缝	(197)
鸡眼里的乾坤	(206)
烈 马	(213)

昼 梦

黑夜是睡眠的时候，
做梦很正常：
白天睡眠就不正常，
做梦当然更不正常。
然而只有在不正常中，
才发生这些故事。
梦已经逝去，
只留下一些淡淡的记忆。

昼梦

充分地理解过去——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；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——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；向后看——就是向前进。

（俄）赫尔岑

艰难跋涉

一辆接站的篷布小卡车把我送进了S工学院大门。

下了车，我已置身在一个新的环境，很难说清心中是一种什么滋味。我提着我所有的行李——一个帆布包和一个老布（农民自己纺纱织的布，但并没有贵州蜡染的风采）包袱，跟着接站的同学向新生报到处走去。当我交出录取通知书、粮户关系后，便获知分配在金属压力加工专业二班，并发给我一只海碗和一把折叠椅（椅背上写着我的名字），安排到12栋3号宿舍住宿。

有必要交代一下海碗。海是大的意思，自然这是一只粗瓷大碗。我是浙江人，我们习惯用小碗吃饭，即便上了中学为了方便起见买了只搪瓷缸吃饭，最多也只能盛二两米饭。然而学院发给我这只海碗大约能打八两米饭，不能不使我发了一阵呆，于是我恍然大悟北方人长得粗壮结实的原因了。等到吃饭时我才知道大家用这只碗既打饭又打菜，在当时粮食不足人们不能奢侈地吃几样菜时确是很方便了。再交代一下椅子。大学生上课不像中学生那样固定在一个教室里，有时在大教室上课，有时在礼堂（兼饭厅）听报告，有时到实验室做实验，有时回宿舍自习，随时带上，实在方便。

当我走进宿舍时，别的同学都到了，原来他们都是提前来到这个向往已久的城市的，其中有班长郭亦武，山东人；谭一声，上海人；叶斌，江苏人；等等。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，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

全宿舍七个人除我之外都是出身较好的，充分体现了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政策。

宿舍有四张双层床，住七个人，留下一个铺位是给大家放行李的。我便睡在靠门口的那张床的上铺，自然是六个同学拣剩的位置了。宿舍是平房，没有水，更没有厕所，但有暖气，这样的条件对我这样的乡下孩子来说，无疑是天堂了。

晚上躺在床上，思绪万千。去年招生 25 万，今年招生 10.7 万，被录取者，都是幸运儿了。像我这样出身的在反右之后能进大学，更是幸运儿了。于是我认识到当初太幼稚了，偏要报考什么名牌大学。幸亏这第九志愿收留了我，要不，随便给我定个政治条件不合格不录取，回到农村从事光荣而报酬极微的繁重的体力劳动，有什么话说！认识到这一点，是极大的安慰。于是我决心以优异的成绩来报效祖国。

我们的教室在 2 号楼，楼前的几十米席棚正是全院的大字报栏。虽然开学前已经冲刷干净了，但仍能使人想象到不久前这里曾是硝烟弥漫的战场，有几百名大大小小的右派在这里一触即溃，成了人民的敌人。这些从教师中学生中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，此刻正在学校从事光荣的体力劳动，如搬运设备、打扫卫生等等，以改造思想。那些学生右派，比我大一两岁，显得很文雅，遗憾的是没有看到这些文雅的书生“疯狂进攻”和“负隅顽抗”的姿态。因为持刀枪杀人者都比较形象，用笔杆子杀人的实在缺乏形象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写了一首《我们胜利了》的诗发表在院刊上，表示我和这些“丧心病狂”的敌人划清界限。

开学典礼上刘教务长的讲话使我难以忘怀。教务长中等身材，头已谢顶，略显肥胖，显出一种大学者风度。当时便有人告诉我他是著名的力学家。他把毛主席称作毛泽东先生，这是我解放八年来第一次听到的。他说毛泽东先生说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，必将出现一个文化高潮。他要我们去迎接这个高潮。他还说广播这玩意儿干扰学习，以后不要放了，又让我吃了一惊。

开学典礼结束后我们夹着椅子回到教室，辅导员马丁兵立即给我们消毒。他说教务长是全国著名的专家，一级教授，保护对象。如果是一般人，早就打成右派了。他的讲话纯粹是胡说八道，同学们不要听他的。

大学生是善于思考的。自然，智商并不低的我也会思考：既然教务长是胡说八道，那为什么还要让他讲呢？他称毛泽东先生，这不是不尊敬我们的领袖吗？他说不要放广播，这不是和我们争夺宣传阵地吗？他的这次讲话，是不折不扣的右派言论。右派是客观存在，他实实在在是个右派，但为什么

保了便不是了？这些问题我好长时间没有想通。

接着，学院反右扫尾工程开始了。第一个回合便是批斗大右派刘飞。刘飞是留苏预备生，是尖子学生。偏偏在出国前补习一年俄语的最后阶段，他攻击了统购统销政策，他说农民把粮食卖光了，饿肚子了，还饿死了人。于是他被取消了留苏的资格。批斗会上，一位工农速中的同学发言慷慨激昂。他说：“刘飞，你出身贫苦，是共产党救了你，是共产党培养你上了中学又上大学，你不思图报，忘恩负义，背叛了自己的阶级，竟敢攻击党，诬蔑党的政策，成了十恶不赦的大右派，要不是党的政策约束我，我真想抽你的筋，扒你的皮！”接着，他便高呼口号：“打倒大右派刘飞！”“刘飞他不投降，便叫他灭亡！”于是大家便跟着他高呼。场面惊心动魄、叫人不寒而栗。

说实话，我生活在农村，卖“余粮”的事情很清楚的。农村把每户的田都做了三定：定产量、定公粮、定口粮，然后算出余粮。公式是：

产量－公粮－口粮＝余粮

在秋收后，政府便按三定收购，公粮必须交，余粮必须卖。产量搞浮夸，定得很高，实际很低，口粮便成纸上的数字了。饿死人的事是确实的，但在30年后才有所披露。刘飞说了实话，便成了右派；那些说假话的，却成了左派。我什么也没有说，自然是中间派了。

扫尾工程的第二个回合是继续反右。辅导员说：机械系还有两个右派没有挖出来（所谓没有挖出来是指党委已经批了，但尚未经过批斗让他们自己承认）。自然，我们新生也要参加这个攻坚战了。那天，我们停了课，吃过早饭便夹着椅子排队进会议室。因为批斗右派比上课重要得多，右派不铲除，国家要变色，学了有什么用！会议室墙上贴着白纸黑字“把右派分子王××、李××揪出来！”“不获全胜，决不收兵”等大标语。还把王××李××的名字颠倒着写，气氛十分严肃、紧张。

批斗大会开始，先让王××同学检查。王××自然避重就轻地说自己学习不够，说了些错话，一直回避可怕的“右派”两个字，这当然是通不过的。于是群情激昂地开始了批判。批判的火力自然很猛，不猛怎么能叫右派投降？开头，一位穿红衬衣戴眼镜长得很漂亮的女生起来发言。她说：“王××说校党委要发扬民主，言外之意便是说党委不讲民主，这就是攻击党的领导。攻击的目的，就是要推翻党，梦想把蒋介石请回来，再骑在人民头上。用心何其毒也。”她的演绎、推论无懈可击。在诸如此类的高水平的批判下，不到两小时，王××便涕流满面，承认自己是右派了。于是便休息20分钟，再攻李

××……

我亲身参加了这次伟大的斗争，感慨颇多。当然，这也有使我迷惑的问题。对那位红衣女子，我以前就见过，我以为她一定是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小姐，一定是个右派，然而她却是左派，我真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觉得可笑。

经过两个回合的战斗，我深感自己危机四伏了。通过对右派的批判，我发现凡出身不好的同学，发言太积极，便是别有用心；发言不积极，又是消极抵制。总而言之，有些人说的永远是真理，有的人说的永远是错误，说话太难了。然而太难了还不能不说。因为第三个回合开始了，那就是大鸣大放。

大鸣大放是以鸣放小组为单位进行的。我在第二组。组长张之明是个高个儿，爱打篮球，对小组的工作有些力不从心，也不想当这个“官”。我同宿舍的都在一个组。另外，还有一名留级生，他是名调干生，30多了，身体很魁伟，是个党员，对人很宽厚。只是班长常常爱教训人。听说他正在申请入党，表现很积极。他越积极，我越觉得对我的威胁越大。

因为大家都有一些反右的经验了，所以说话都很谨慎，从不放要害问题，只拣些哪里有浪费这类小事来放。自然鸣放小组显得死气沉沉。辅导员对我们组不满意，批评了几次。但是批评归批评，鸣放还是照旧。谁愿意往火坑里跳！我是有自知之明的，因此总是小心谨慎地鸣放。也许是我太稳重了，也许是我能写一手好字和一手好文章，同学们都很赏识我。不被人赏识固然不好，但被人赏识不一定是好事。别的不说，整理材料抄写大字报便历史地落到我头上了。而更为难的事情还在后面。

风波骤起

一天，照例是鸣放小组开会鸣放。组长突然提出要求不担任组长工作，说自己不能胜任。他提议我担任组长，说我能写文章，有组织能力。不知是他的诚恳，还是别的同学也有这种想法，全组同学竟然都同意了。但我坚决不同意，因为组长是院方指定的（其实是辅导员指定的），根本不是民主选举的。我找了很多不能任组长的理由，如我不是团员、思想水平低，等等，但是班长也说叫我当，党员也说叫你干你就干。我把目光投向辅导员，辅导员笑着说：“同学们相信你，你就干吧，没啥了不得的。”他是山东人，带着浓浓的山东腔。推又推不了，摔又不敢摔，只好硬着头皮干。

让我当组长对大家有很多方便，不用别人记录，做记录是大家都不愿意干的事。而且抄大字报也是我了，贴大字报也是我了。当然，其他同学还是积极帮忙的，比如找纸和墨水，提糨糊桶刷大字报等。

然而鸣放时大家都是很谨慎的，如同走路一样，总要绕开那些危险的区域，只把路上偶尔看到的小石子踢几脚。其实说穿了，都是一个“怕”字，怕冒出几句“右派言论”来扣上一顶“右派分子”帽子。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自然，辅导员看穿了我们的顾虑。他说：“右派分子是客观存在，也就是说本来就存在的，不是鸣放放出来的。同学们你们都不是右派，你们就不可能放出右派言论来的。更不会打成右派。”辅导员的逻辑很严密，无懈可击。但是同学们心里很清楚，因为谁只要越雷池一步，马上就有人说某某人本来就是右派，本性难改，这回就跳出来了。同样是无懈可击的理论。这些理论学好了，随时都可以解释发生的一切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

尽管如此，全组同学的眼睛还是盯着看学院办的那次浪费展览。说什么进口摩托车是个极大的浪费，浪费的是人民的血汗钱；那台闲置几年的机器没有活儿干，少创造了多少财富等等。

于是辅导员又启发道：“咱们这幢楼本来就是院属工农速成中学，今年起不再招生了。今年毕业的还有12名同学没有考上大学，学院决定补习一年，明年再考。现在他们都返校来学习了。他们都是生产岗位的劳动模范、积极分子。现在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：一种说应该补习，让他们再考大学。”“如果他们明年还考不上呢？”有一位同学插嘴问。“那就知不道了。”辅导员说。他总是把“不知道”说成“知不道”，这是山东人的习惯。他接着说：“另一种看法是他们基础差，学习费劲，不如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干活，还能给国家做更多的贡献。你们也可以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。”

我想，这倒是个好题目，碰不着统购统销、党的领导、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敏感的问题，安全系数比较大，出不了差错，就动员大家鸣放。果然，这回鸣放就热烈起来了。大家的看法完全一致，都认为他们在生产岗位上更能发挥作用，将来一样可以当车间主任、支部书记甚至厂长。而学习，他们基础差，今年考不上大学，明年也不一定考得上。还是扬长避短为好。再说，学校为工农开门，招收一些工农出身的尖子学生上大学深造也是一样的。

我记得班长当时发言也是神采飞扬的。只是党员不多发言，只是笑笑。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写成大字报贴出去，另外再抄一份投院刊。自然，这个光荣任务落到我头上了。我写了一份底稿，立即念给大家听，让大家逐字逐句

进行推敲。这样做，一则发扬了民主，二则大家推敲了肯定能不出问题，也可以说这是我当组长的为了保护自己所采取的手段。底稿一致通过了，便由一位同学念，我抄大字报，另外一位同学抄在稿纸上。这样稿子抄好了，大字报也写完了。我们兵分两路，一路将稿子送院刊编辑部，一路便到大字报栏张贴。我呢，同学们说我太辛苦了，让我休息一会儿。

当一个人做完一件工作，总有一种轻松的感觉。放学时我走过大字报栏，远远就看到我抄写的大字报《这是为什么？》。它像是我们共同设计的一件艺术品，在向我们亲切地打招呼。我想，一定已经有很多人看过了。去吃晚饭的时候，我便听到了很多议论。当然，议论的都是新生。因为新生爱串联，熟悉起来快，也爱议论。老生经过一次反右的洗礼，更有经验更沉默寡言了，然而我当时以为他们是摆老资格，不屑一顾。

第二天上午，环绕这张大字报贴出几份支持的大字报，都是新生写的。老同学也来看，但讳莫如深。

第二天下午正课完了，我们正在上自习课，发院刊的人递了几张院刊进来。靠近教室门口的同学翻了一下，就嚷嚷说：“我们的大字报登出来了。”于是大家争着看，因为内容大家都已经知道，看也无非再知道一下版面和铅字罢了。传到我手中时，我仔细地读了一遍。并不是为了欣赏自己的文笔，这种文章，谁写都大同小异，无文采可言，主要是看看有否修改，和原意是否有出入。因为这是政治运动，出点差错谁都担罪不起的。看到文字未作修改，也没有错，我就放心了。说老实话，自从当上这个组长后，事事我都倍加小心。我觉得我的心随时被淋湿，随时赶快擦干，以避免“触电”。

直到第二天晚上，还是不见一张不同意见的大字报。

第三天早上，我去吃早饭，大海碗盛了一两稀饭，上面盛着一分钱咸菜，手里拿着一个二两的馒头，正吃着，忽然稀饭里搅出了一只苍蝇。同桌的同学看见了，叫我倒了。我走到剩饭缸前，用筷子挑出了那只苍蝇，便将稀饭吃了。一位同学问我，为什么不倒了再买一碗。我想说中国还有好多人连有苍蝇的稀饭都喝不上呢，但我没敢说，只是笑着说：“不碍事，苍蝇早就烧死了。”

做完课间操回到教室打过上课铃，老师来了，大家起立时，我身边的叶斌对我说：“有人在大字报旁边用钢笔写了一些小字，说把他们的‘他’字写成牛字旁了。落款是工农速中一同学。”我说：“大字报抄写完大家都看过，这是不可能的。”牛字旁的“tā”早就淘汰了，而且，淘汰之后我再也没有写

过，这是绝不可能的。但是既然有人找岔子，我必中便犯嘀咕。自然，一节化学课我一点儿也没听进去。

下课后，我立即跑到大字报栏前去看了一眼，大字报上只是把“他”字的“亻”旁写得粗了一些而已，丝毫没有“牛”字的影子。钢笔小字报是这样写的：“看，这是牛字旁的，他们在辱骂我们。这个字寄托着不可告人的目的。”然后画了一个箭头指向那个“他”字。

我想起来了，两天前我抄大字报时，念的同学先念的是“我们……”，当我写了半个“我”字时就喊“错了错了，是他们”，便让我改过来，于是我便在半个“我”字上压了一个特粗的单立人。

这是无中生有的事，白纸黑字在。但是我心中还是害怕，因为我知道自己是泥塑的，不是铁打的。即使是毛毛雨，也会淋坏我，何况来的已不是毛毛雨了。

憋了两天的速中同学，由于发现了这个“突破口”，到了下午，便贴出了十几份小字报。什么“寄托着资产阶级复辟的梦想”呀，“地地道道的右派言论”呀，“把隐藏在新生中的右派分子抓出来”呀，“狐狸尾巴露出来了，抓住，别让它溜掉”呀，“不获全胜，决不收兵”呀，都来了。这片席棚已成了全院的热点焦点。

再过一天，反诘的大字报质量更高了。一张压住了原来支持我们的大字报的大字报说：“党的教育方针是学校为工农开门，那是为了让工人农民在政治上翻身之后取得文化上的翻身。文化上翻不了身，政治上的翻身便不能巩固。工农子弟不等于工农。工农在旧社会受尽压迫和剥削，现在当家做了主人，就要攀登文化高峰、科学高峰。企图以工农子弟混同工农，不让工农在文化上翻身，实质是资产阶级专工农的政，用心何其毒也。这是十足的右派言论。我们坚决要求把大字报的炮制者揪出来，赶出校门！”落款是一群工农学生。

本来是一股小小的旋风，此刻酿成风暴了。要求把“炮制者”揪出来的呼声越来越高。我知道，那张大字报惹怒了工农速中学生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还是说清楚事实吧，我认为只要把问题说清楚，一定会获得他们的谅解的。于是我写了一份长达5000字的《大字报的真实情况》的广播稿，送到广播室，署名“压一二班第二鸣放小组组长”，当天便在广播里播出了。

我的稿子播出之后，发现有同学在大字报前轻声嘀咕着，有的说这确实不是牛字旁的，有的说胳膊拧不过大腿。这以后，出现了一段冷场。速中同

学也不再贴大字报了。支持的大字报也没有了。但是我还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。

一天下午召开全校师生形势报告会。最后，院党委书记顺便提了一句：“《这是为什么？》这张大字报，我看不能算右派言论。”当时，我像在洪水中挣扎了三天三夜的落水者，突然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，一颗悬着的心儿落了地。

经历这次风波之后，我的思想、生活、前途似乎都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我发现只有少数知心的同学在没有人的时候和我说几句话，安慰几句，在公众场合一概不答理我，仿佛我得了易传染的麻风病一样。

我也不写日记，因为有一个同学就是被别人发现日记而被打成右派的，何必自找麻烦。当然，我今天写着这篇小说的时候，多么希望有一本日记作参考啊，但实际是即使写了也是留不下来的。以致我今天也只能从模糊的回忆中来记述。忘却是一种幸福。可惜还没有全部忘却。

雪上加霜

转眼便过新年了。

除夕那天晚上，食堂增加了几个菜。以前，我几乎中午晚上一律吃红白豆腐（羊血烧豆腐），每碗五分钱；今天，我决心花两角钱改善一下生活，买了一个炒菜。只是人太挤了，当我买完菜从人群里往外挤时，不小心我的大海碗和一位不认识的同学的碗碰了一下，端到灯光下仔细一看，裂开一条大缝。除夕之夜发生这事可不是好兆头，以致那天吃完除夕饭还有些闷闷不乐。

过完新年，便是期末考试，高等数学、画法几何、普通化学、制图，我都取得了全班最好的成绩。我中学学的是英语，大学改学俄语，所以俄语差一些。总而言之，我觉得我的考试成绩是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的。考试结束后，便是思想总结。我征求班长的意见，班长要我深挖根源好好改造；我征求党员的意见，他给我一些安慰后，要我老老实实总结，要相信党的政策。我觉得党员比班长好接近多了。在班长眼里，我好像就是右派了，但党员还把我当人民看待的。看来，人们衡量的标准都不同。

我的思想总结自然要在班会上进行。我想，在班上总结无异于一次演出。但是，一个犯了错误的人，演出就太难了。语言要恰到好处，帽子要扣得恰

如其分。要做出一副老老实实痛改前非的样子，必要时还要洒几滴眼泪。但是我这个人不爱流泪，堂堂男子汉，干吗要流泪？反正，我就实事求是地说吧。我承认反对工农速中同学返校学习的想法是不对的。“他”字的问题我没有错，没有错自然一字不提。

大凡犯错误的人作思想总结，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不深刻的，因为评论者总有话在等着你。什么“未触及灵魂”，什么“光扣大帽子”，什么“蒙混过关”，什么“态度不诚恳”等等。

我总结完了，叶斌、谭一声便表态说我的检查态度诚恳，以后要吸取教训。我知道，他俩是在帮我过关，患难时候见真情，他们的情谊我是终生难忘的。

正当出现一些转机的时候，突然袭来一发炮弹，轰得我晕头转向，那便是班长的发言。班长说，他从我中学的同学那里了解到，我在中学时就有右派言论。主要有两条：一是我在匈牙利事件后说过“这回苏联出兵就对了，要是美国出兵就不对了”，很明显这是攻击老大哥苏联。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。一是我高三时入团填写了志愿书未批准，说我人不了团就加入民主党派，思想反动。

这两件事，事实是这样的：

苏联出兵匈牙利后，一天在课间休息时，我和尚小明同学在教室门口谈话。这时，张立甫同学从教室后面走过来，冲着我俩说了那句话，怎么就张冠“陈”戴戴到我头上来了呢？但是我还不把张立甫供出来，怕他所在的大学也会找他麻烦，只得坚持说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

还有，我中学时要求入团未能批准，团委书记找我谈话，那天他带着我走出校园直走到稻田边的田埂上。他说现在整团，不发展了，你人不了团不要灰心……我说斯大林同志说过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靠的是共产党员和非党布尔什维克。我入不了团，还可以做非党布尔什维克。

这两件事我毫无错处，怎么一句话篡改了一句话移花接木到我头上来了？确实，在S工学院有我一个中学同学，但他上高中时不和我同班。即使同班，也不可能了解这两件没有参与的事情。这里面大有文章。一定是团委书记和尚小明他们干的。20多年后，我在一所中学教书，学校要整理我的档案，我才确切知道我考上大学后，他们整了我的一份材料，盖了县委的大印送到省招办，省招办又转到S工学院的。县委的意见是：“该生思想反动，送回原籍劳动。”招办的意见是：“视情况而定。”至于他们改动我的原话和张冠李戴，